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5年 第3期 总238号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对华决策模式研究
——以互设LT贸易联络处为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东方语言学院 鹿雪莹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刘守军

[摘 要] 1962年11月,中日双方签署了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重新步入正轨。1964年4月,双方又商定互派贸易联络员与互设联络处一事。本稿以日本对中日互派LT贸易联络员与互设联络处的应对为中心,对LT贸易时期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探讨。其一,在两国互设联络处过程中,日本非政府渠道发挥了影响或干预政府外交功能的作用;其二,在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特殊背景下,日本政府内部反应复杂,即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不限于外交主管部门外务省,政府各部门间的相互牵制或妥协也影响了其外交方向;其三,实现互设联络处体现了日本对华积极的一面,但也暴露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局限性。同时,日本政府首脑对华态度积极与否,也直接影响到其对华外交成效。

[关键词] LT贸易 互设贸易联络处 日本对华政策 非政府渠道

引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导下,52个国家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旧金山和约》,随后,美国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其他多项协议。1952年4月,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和中国台湾方面签署了"日台条约"。由此形成的"旧金山体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重要体现,对日本以及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且长期的影响[1]。

日本虽受到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日台条约"的严重制约,但也意识到不可忽视中国大陆,意图通过民间贸易为将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保留余地。在中国"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民间人士的努力下,1952-1958年双方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1957年1月上台的岸信介内阁奉行"亲美反华"的外交政策,导致1958年5月中日民间贸易全面中断。1960年7月成立的池田勇人内阁推行重视经济的对华外交政策,在中日双方的努力下,1962年11月9日,双方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LT贸易协定),中日贸易重新步入正轨。随后,中方在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在东京设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也称"高碕办事处"),并指定廖承志、松村谦三分别为双方政治关系的窗口,廖承志和刘希文、高碕达之助和冈崎嘉平太分别为经济关系的窗口。故此,由LT贸易协定建立起来的LT渠道不仅限于贸易,也成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经济界与中国交流的窗口。

1964年4月19日,中日双方发表了互设LT贸易联络办事处、互派代表的会谈纪要,同时签署了记者交换协定。1964年9月与1965年1月,中日双方首次实现了向对方首都派遣联络员、设置联络办事处。LT贸易联络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间互设的第一个常驻机构,具有贸易代表部的功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交的背景下,联络处的设

置为中日双方的相互理解及人员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在推动双方友好关系，进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LT贸易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日友好史观视野下的LT贸易的意义（古川万太郎，1988）；其二，LT贸易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响（阎树森，1992；添谷芳秀，1997；李恩民，1997；鹿雪莹，2011；张千任、陈景彦，2019）；其三，LT贸易体制的形成过程与中日间交涉（木村隆和，2009；長谷川貴志，2012；鹿雪莹、刘守军，2017）；其四，池田内阁的对华贸易政策与LT贸易（井上正也，2006；李明楠、宋志勇，2022）。另外，中日关系通史对LT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但有关中日双方互派联络员并互设联络处方面，却鲜有研究涉及。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对日经济政策中廖承志的作用，但其重点一般放在了LT贸易的达成方面，对中日互设贸易办事处或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山影统，2016；井上正也，2019）；也有学者探讨了中方驻东京联络处的设置过程及其对日工作情况，但对日本政府的态度着笔较少，也未涉及日方驻北京联络处的设置过程（杉浦康之，2013）。有鉴于此，本稿主要运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并辅之以部分中国外交部档案，探讨日本政府及非政府渠道对中日互派LT贸易联络员与互设联络处的态度，以此对LT贸易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一解析。

1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约定互派联络员与互设办事处

早在1953年10月签署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际，中日双方便开始提及设立通商代表部事宜。1955年5月与1958年3月第三次、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之际，双方也就该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达成了一致。但由于1958年5月中日交流全面中断，设置通商代表部一事也不了了之[2]。1962年11月LT贸易协定签署后，互设常驻办事处一事提上日程。1963年4月29日中国代表团访日之际，日方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与廖承志办事处孙平化、王晓云就互设常驻机构、互换新闻记者一事进行了协商。通产省官房长渡边弥荣司也与孙平化会谈，对此表示支持，孙平化表示中方将对此事进行具体研究[3]。

1963年7月25日，廖承志就互设常驻办事处的必要性请示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交部长：随着维尼纶成套设备进口协定的签署，需要对派往日本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且目前中日之间还不具备邦交正常化条件的情况下，没有能够了解日本动向的常驻人员，从政治上讲是非常不利的，并提议在设立常驻机构的同时派遣常驻记者。廖承志的请示于8月28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赞同，周恩来指示可以在将要进行的LT贸易第二年度交涉时打探日方的意向[4]。

按照既定方针，在1963年9月进行的第二次LT贸易交涉的最后阶段，廖承志提出该议题。对此冈崎嘉平太回答：日方也在讨论该问题，但由于担心会因台湾当局的阻碍难以保证中方代表的安全、中方的派遣人数过多、悬挂国旗等问题，所以暂时搁置了。对此廖承志回答：中方也考虑到台湾当局会阻挠，但应该不成问题；不会派太多人；中方代表处是非正式机构，可以不必每天悬挂国旗。冈崎表示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允诺回国后再作商议[5]。1964年1月，随中国青年京剧团访日的孙平化按照廖承志的指示，再次与松村、高碕商议互设常驻办事处与交换常驻记者一事。2月7日，自民党议员、LT贸易政治顾问田川诚一与藤井胜志受松村委托访华，又与中方交换了意见，双方就促成此事达成一致（杉浦康之，2013：142）。

为推动事情的进展，1964年2月19日，高碕办事处事务局长大久保任晴向日本政府提议互换新闻记者、互派联络员等事宜[6]。对此，2月26日日本外务省干部会经过讨论认为：①高碕、廖承志办事处的人员交流很频繁，又有电话可以随时联络，且各厂商代表、技术人员的往来可随时应对，没有特设常驻联络员的必要；②比起推进贸易，中方旨在通过渐进积累改善日中关系全局，这与日方“政经分离”的原则不符；③廖承志是中方高层领导，廖承志办事处也不是单纯的贸易机关，而是对日工作的一般性机构，具有日方外务省政务局的性

质，如果允许互换联络员，即便是将其活动限定在LT贸易实施范围内，也很难防止其文化宣传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外务省断定：改变LT贸易的现状，政治方面的障碍大于所带来的利益[7]。

“政经分离”是池田内阁处理中日关系所遵循的一贯原则，即一方面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的法定政府，另一方面与中国大陆进行民间经贸往来。在这种模式下，外务省力求避免因改变LT贸易现状有可能引发的政治上的质变，同时也担心这种变化会影响日美关系、动摇日台关系，因此反对日中双方互派联络员。通产省则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考虑，对此态度积极：为了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正常发展，应大力促进两国现行的LT贸易；允许高碕办事处、廖承志办事处互派常驻联络员，将会促进LT贸易的健全发展。为此特别批准了以下事项：贸易联络员可以在高碕办事处与廖承志办事处之间交换；联络员的工作仅限于为推进LT贸易顺利发展所必需的运营工作；联络员双方各派3人，停留时间可按照相互主义原则，不少于1年[8]。

互派联络员问题在日本政府内部付诸讨论之际，1964年4月9日，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率团访华，同中方具体商讨了互派贸易联络员、互换记者等问题。周恩来、廖承志等中方领导人与松村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19日双方发表了互设联络办事处、互派代表会谈纪要，约定双方互派的代表暂定3名、随员2名，可根据需要进行增员；双方代表每次的停留期限为1年以内；双方的代表与随员6月中旬前到达对方国家等。另外，交换新闻记者会谈纪要约定双方交换记者8名，在对方国家的停留期限为1年以内，第一次记者派遣应于1964年6月末实现[9]。对此松村表示：由此两国的亲善关系将会焕然一新；廖承志表示：这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贸易[10]。

反观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由于担心对日台关系带来影响，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强调：松村访华应以与政府无关的个人资格进行；互派贸易联络员方面，即便是单纯的联络员，也是迈向通商代表部的第一步，需要考虑其政治影响，因此允许中方以商讨贸易问题而不是常驻的形式来日，可以适当延长逗留期限；有关交换新闻记者问题，原则上同意实施，交换人数、逗留目的仅限于采访活动，活动自由的保障等问题需要双方相关人员商讨后政府再行表态[11]。由此可见，外务省不仅没有提及互设联络处，对互派联络员一事仍持否定态度。

不顾外务省反对，松村等人与中方约定了互派联络员的具体事宜，双方还明确表示互设联络办事处。由此可见，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是日方松村谦三等LT贸易人员与中方达成的默契。对于中方来说，此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导，完全是政府行为，但对于日方来说，日本政府对此并不积极，甚至表示反对，只是在日方LT贸易人员的推动下表示予以考虑。松村等人在没有得到政府首肯的情况下便与中方就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并积极推动日本政府向同一轨道行进，这体现了非政府渠道人士或民间贸易机构发挥了影响或干预政府意向的功能。同时，中方所提倡的“民间先行”在日本对华政策中也得以体现。

另一方面，松村之所以能和中方就此事达成协议，离不开池田首相的支持。池田首相想要推进日中贸易，把松村当作自己朝向中国的“脸面”，一直与其保持紧密联系，中方也把松村看作LT贸易的日方“总联络人”。1964年5月7日，访华回国后的松村拜访池田首相，要求尽快实现互派贸易联络员、互换记者一事，池田首相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12]。因此，作为沟通中日双方政治意图的桥梁，松村等LT贸易人员的作用不可忽视。

2　从反对到同意：外务省态度的转变

日方LT贸易人员虽就互派联络员与互设办事处一事与中方达成了一致，但具体实施离不开池田内阁对华外交的意向，也须征得外交部门外务省的同意。如前述，哪怕仅是互派联络员，外务省对此也态度消极。

LT贸易签署后，日本政府也积极配合贸易的具体实施。关于中方非常重视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方面，1963年6月30日，仓敷纤维与中

方签订了出口合同。尽管担心有可能会影响对美、对台关系，池田内阁还是于8月26日正式批准了仓敷与日纺的维尼纶成套设备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融资进行对华出口[13]。但这引起了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1963年9月，台湾当局召回张厉生驻日代表，1964年1月采取了撤离“驻日代表处”、停止对日物资采购等报复措施并发动对日示威活动，日台关系面临危机（東西通商課，1965-02-06）。为挽回日台关系，1964年2月，池田首相派前首相吉田茂携带自己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件访问台湾。4-5月，吉田茂又与张群秘书长交换书简，允诺向中国出口的融资按照纯粹民间方式；不承认日纺维尼纶成套设备通过进出口银行融资进行对华出口[14]。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吉田书简”。该书简的出台为发展中的LT贸易带来了极大障碍。

外务省之所以反对互派LT贸易联络员，在于不想再因此恶化日台关系，影响日美关系。但松村谦三既已访华并与中方发表了会谈纪要，迫于舆论压力，外务省内部再次就此事进行了探讨。外务省中国课认为：互派常驻联络员一事一旦实现，中方人员会在高碕办事处内设置办公室，不仅会从事贸易事务，也会涉及到文化等政务性业务，毋容置疑，联络处实际上是中国的半官方且具有一般性功能的驻外机构（即中国对日关系的“总窗口”），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故此中国课建议：日本现阶段坚持“政经分离”，所以要坚决避免设置“办事处”的形式，仅限于当初设想的“派遣联络员”；联络员的入境目的仅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活动，非如此日方可以要求其离境[15]。

外务省经济局也认为：虽然2月26日的干部会不同意交换联络员，但如今看国内的舆论动向，干部会的决定已难以为继；鉴于办事处会成为政治色彩浓厚的半官方驻外机构，应尽量避免设置。为此，4月24日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仍坚持没有派遣常驻联络员的必要；第二方案主张：①允许互派常驻联络员，可以实施其功能，但不得悬挂办事处的标识，不允许设置办事处；②活动范围仅限于LT贸易事务联络；③双方人数均在3名以内（这一点亦可放宽）；④日方联络员仅限于高碕办事处成员，避免派遣纯政府机构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员，且派遣时不可使用政府预算（补助金）。另外强调，会谈纪要与政府无关，不具有政府是否承认的性质，政府仅介入中方人员的入境许可问题，并提议尽量使用第一方案，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第二方案[16]。

对此外务省中国课课长认为：政府首脑与松村、冈崎等人的想法大致相同，按照第二方案推进已在所难免，但就第二方案带来的利弊做了如下判断。

①若按第二方案进行，日方的“联络员”不要说避免“准政府机关的人员”，就连避免“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人员”这一原则也难以贯彻，这对外务省来说对外难以做解释；

②高碕（冈崎）办事处正逐步接近通产省，如果派遣以通产省为背景的人员作为联络员，只要不是通产省现职人员，外务省恐怕也难以“考虑国府”为借口加以反对；

③如今，通过自民党左派，社会党、共产党等诸政党，友好团体、商社等大小各类管道形成的“日中外交”，如果再加上无视外务省的通产官僚的介入，容易形成一条更牢固的主线；

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通产省本身意图掌握对华关系的主导权，如今若与中方的打算相结合，把“联络员”作为发展今后日中关系的主要渠道并直通政府首脑部的话，外务省有可能陷入被排除在外的尴尬境地；

⑤鉴于以上情况，外务省如果打算放弃日中关系的主导权姑且不论，若不打算放弃，就应当把“以本省为后台”的人员通过高碕办事处派往中国，从日本外交的全盘出发积极规划日中关系的发展方向[17]。

4月27日，相关问题及中国课课长的意见在外务省干部会上付诸讨论，结论表示第二方案是外务省做出的最大让步。虽然意识到通产省在对华关系方面的积极主动会给外务省的外交“主导权”带来“威胁”，但对中国课课长建议外务省介入“联络员”派遣的提案仍不予采纳[18]。

4月28日，随同松村访华的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拜会大平正芳外相，就访华时双方关于互派

联络员、互设联络处的会谈情况做了汇报。对此大平表示：政府不打算对该问题严加干涉，但会提出一些要求，并且还需要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协商[19]。于是，外务省内部继续对此事进行反复探讨后认为，政府可以在不违背“政经分离”的基本方针下积极推进双方贸易，对主要问题的意见大体与4月24日提出的第二方案一致，只是放宽了联络员派遣人数，明确了停留期限，对双方人员派遣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20]。

由此可见，出于对松村访华后舆论动向的考虑，以及与通产省争夺日中关系“主导权”的面子意识，外务省内部对互派联络员的态度前进了一步，由原来的坚决反对，到最终在“政经分离”与“政府不介入”的前提下予以认可，但对互设联络处一事仍持反对意见。

3 日本政府内部的相互妥协：中方派遣联络员与设置联络处的实现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不限于外交主管部门外务省，因涉及到双方的贸易关系和联络员入境、停留等问题，还须征得经济管理部门通产省与执法部门法务省的同意。外务省方案首先向通产省进行了说明，通产省对中方联络员相关规定无异议，但就日方联络员问题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一，关于纯民间人士的问题，通产省也没打算派遣官员前往，但考虑到可能没有合适的民间人士，这一点需要弹性对应；其二，政府预算的使用方面，可以把用于派遣人员的补助金计入通产省预算，因此不应正面否定这一点[21]。如前述，通产省从起初就主张推进互派联络员一事，因此在日方派遣人员的选择与使用政府资金方面提出了积极意见。事实上，通产省后来也派出了以通产省为背景的联络员并允许使用政府补助金。

外务省方案又转交法务省进行讨论，法务省也大致表示同意，但主要以限制联络员的活动内容为目的，5月25日对外务省方案提出了两点异议：其一，法务省主张，应具体列出禁止中方联络员进行的活动内容，为防止其进行这些活动，在日保证人及联络员本人需要提交誓约书（外务省案只需在日保证人提交）；其二，停留期限方面，外务省允许1年以内，但法务省主张180日进行一次更新[22]。针对第一点外务省认为：让联络员本人提交保证书与誓约书，中方必不会答应，实际上等同于拒绝联络员入境；即便提交，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所以按照惯例，保证书与誓约书均由在日保证人提交即可（有关在日保证人问题，松村谦三与冈崎嘉平太均在备选之列，但日本政府认为政治人士尽量不要介入，最后决定由冈崎任中方联络员的在日保证人）；停留期限方面，外务省认同了法务省180日进行一次更新的意见，并指示冈崎向中方转达该决定[23]。

有关誓约书的内容，日本政府各部门间进行了多次沟通。6月26日大平正芳外相、贺屋兴宣法务相商议后，对誓约书内容做了如下规定：①不得从事入境目的以外的活动；②不得进行一切政治言论与行动；③需申报工作场所、居住地、国内旅行等；④不得使用“办事处”“代表”“随员”等名称；⑤不得悬挂国旗及相关标识[24]。

6月27日，外务省经济局长会见冈崎嘉平太，转达了外务、法务两大臣的协商结果。冈崎表示对誓约书内容基本没有异议，但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①对方完全没有进行政治活动与领事事务的意思，日本政府却率先提出这些政治性话题，只能起到相反效果，简单写成“不得进行政府机构行为”即可；②“办事处”“代表”等字眼随处可见，并非是可以混淆为政府机关的名称，不应对这一点令行禁止；③“入境斡旋”方面，比如议员的访华打算通过办事处来介绍，不允许进行这种事实行为上的斡旋是不合情理的，希望政府从日中关系大局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冈崎称，中方联络处的性质绝对不可能是纯民间的，经济局长也表示在默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表面上以纯民间为原则进行处理[25]。

外务、法务两大臣就中方联络员入境问题的协商在台湾引起很大震动。6月27日，台湾纸媒以“日本对中共态度软化”“承认中共在日办事处的设置”“免除中共官吏提交书面保证书”等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并称日本的这一决定将会使台北、

东京间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26]。台湾当局坚决反对受日本政府资金资助的日中进出口组合以任何形式与中方缔结贸易协定，反对双方以任何形式互设通商机构[27]。对此外务省情报文化局解释：允许中方有关人员入境，只是对个别联络员的入境许可，日本政府并没有认可中共政府机关或与之类似的驻外办事处；联络员的活动仅限于进行日中综合贸易的联络事务，政治活动等入境目的以外的行为一概不允许；因此允许联络员入境，没有任何打算改变政经分离基本方针的意思[28]。

在台湾当局的反对声中，双方并未停止对互派联络员问题的推进。中方对互设贸易联络处的态度很明确，认为开设贸易联络办事处与交换记者不可分割，希望一并实现，如果日本外务省只允许后者却对前者感到为难，中方可以等到两者都能实现时再做打算；中方答应，驻东京的中方联络处可设在高碕办事处附近，不悬挂国旗，对于日方所担心的中方驻东京联络处会成为政府代表机构的问题，强调不以任何政府形式出面，东京有台湾的代表，所以中方不会自行制造两个中国[29]。1964年6月初，中方确定任职于人民外交学会、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办公室的孙平化为首席代表，吴曙东、陈抗、林波、康敏为联络员人选[30]。

中方驻日联络员确定后，在入境条件问题上又生波澜。法务省态度强硬，主张由中方联络员本人签署保证书与誓约书。经外务省调解，最后双方同意由保证人冈崎嘉平太签署。但贺屋兴宣法务相认为必须详细规定禁止中方联络员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条目，故此誓约书里列举了被限制的政治活动的具体内容。松村与冈崎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一入境条件过于苛刻，多次与法务省进行了交涉。7月2日，松村拜访池田首相时表示，交换LT联络员一事若不能实现，自己将退出日中贸易。在松村的“威胁”与池田首相的“决断”下，同日，日本政府向冈崎下达了誓约书以概括性内容为主的最终方针，禁止政治活动事项的具体内容不对外公开，仅作为冈崎与法务省之间的谅解事项[31]。3日，松村打电话给廖承志，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见，告知可以进行入境手续申请[32]。

各方准备就绪，1964年8月13日，孙平化首席代表一行5人赴日。9月8日开设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9月29日，中方记者5名，日方记者9名分别赶赴东京与北京，双方的办事处分别作对方记者的身份担保，故此俗称“LT记者”（嶋倉民生、井上正也，2018：338）。

以上，互派联络员是日本外务、通产、法务三省相互妥协的产物。从三方的应对来看，通产省从起初就希望实现此事，因此态度最为积极；外务省则经历了从反对到同意的过程；最为消极的是法务省，不仅主张让中方联络员本人提交保证书与誓约书，又在誓约书内容上设置了重重条件，并缩短了停留期限。由此可见，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不限于外交主管部门外务省，政府各部门间的相互牵制或妥协也是其外交特征之一。

4 外务省的长远打算：日方派遣联络员与设置办事处的实现

如前述，LT贸易的发展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前首相吉田茂的访台与“吉田书简”的出笼虽然暂时缓和了日台关系，但日方允许日中双方派遣联络员又使台湾当局大为恼火。池田政府虽然有发展日中贸易的积极意向，但也没有因此改变其基本外交立场、疏远台湾的打算。为修复日台关系，在处理好中方LT贸易联络员入境问题后的1964年7月3日至5日，大平正芳外相访问台湾。

讨论中方联络员问题的同时，日方也在加紧考虑日方联络员派遣问题。冈崎嘉平太原本打算派遣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理事村上公孝，以及日中进出口组合事务局长兼通产省通商局进口课班长大和田祐次。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通产省、外务省没有同意任命村上公孝，而是考虑退职人员，或者地方通商局部长[33]。1964年9月上旬，通产省任命通产省四国事务局总务部长相马常敏为LT贸易日方首席联络员，对此外务省表示同意[34]。10月2日，日方又任命大和田祐次为北京联络员，另一名确定为东京银行监查田中聪介。冈崎嘉平太与松村谦三商议后表示对此无异议[35]。

1965年1月11日，廖承志办事处致电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表示“欢迎冈崎嘉平太与大久保任晴两位先生访问北京，同意日方三位联络员同行，联络贸易事务。”同日，冈崎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加紧规划访华行程[36]。1月26日，相马首席代表一行3人到达北京，28日，设置了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处[37]。

直至1965年11月，日方联络员还出缺两名。通产省打算再从本省内派出两名进行充实，但冈崎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充分活用LT联络员制度，外务省应该派一名了解中国问题且对国际政治敏锐的外务省人员前往中国。外务省认为此事确有益处：①可以成为掌握中国第一手情报的消息来源；②可以防止中国因偏颇的情报对日本产生误解，根据错误的认识对日本采取行动，且可以成为重要意图沟通的渠道；③建立这一渠道，可以形成与亲华左翼势力相对抗的力量；④外务省职员结识中国政府各层面对日政策负责人，或者借此培养能够实际接触中国外交的人才，可以为将来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做实质性准备[38]。

鉴于以上考虑，1966年3月22日，通产省补充日本贸易振兴会的内田祯夫为LT贸易日方驻北京联络员后，6月1日，外务省派出前外务事务官田熊利忠为联络员，同时东京银行的羽石修三接替田中聪介赶赴北京[39]。外务省一改绝不允许该省人员介入联络员派遣的初衷，下决心派外务事务官田熊忠利，这是LT贸易业界人士积极推进的结果。当然，考虑到一贯所坚持的“政经分离”政策，并担心有可能遭致台湾当局与美国的抗议，外务省与通产省的派出人员都要求辞去省内职务。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形势下，佐藤政府派遣外务省出身的人员前往中国，也想在可能的条件下保留一条与中国相通的外交渠道，为将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留下余地。当然，一两名人员的派遣并不表示外务省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华政策，但支持和配合松村、冈崎等LT贸易人员实现互派联络员与互设联络处，体现了日本政府虽受邦交正常化前的诸多制约，也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由此，在LT贸易人员的积极推进，以及通产省与外务省的配合下，中日双方互派LT贸易联络员与互设联络处一事终于实现，相关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日美、日台关系的考虑，日本外务省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外认可互设联络处一事，但最终还是在“政经分离”框架内默认了松村谦三与中方签署的与其意见相左的互设联络处、互派联络员会谈纪要，并在联络员派遣的具体实施方面给予了相应配合。互派联络员的实现在事实上促成了联络处的设立，这不仅促进了LT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使渐进积累方式下的中日关系前进了一步。对此，有日本新闻媒体评价，联络处的设置使“日中贸易迎来了新时代，为政府间贸易打下了基础”[40]。

对于日方来说，中日两国间没有驻外使领馆的情况下，驻北京联络处是在当地收集相关情报并与中方进行意向沟通的唯一机构，在推动双方相互交流及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中方来说，在日本设置常驻办事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中日民间贸易以来的夙愿，该事能够实现，中方的积极推进尤为重要。与当时民间贸易时期坚持设置通商代表部、悬挂国旗、争取通商部代表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态度不同，中方在此次互设联络处一事上采取了现实且灵活的方针，表示不悬挂国旗，不把驻东京联络办事处视为政府间机构。这既是为了避免给外界留下自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印象，也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凸显了中方不计前嫌、和平共处的积极态度。

同日方一样，除推进双方贸易外，中方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掌握日本相关的第一手情报，其二是通过在日联络员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为将来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正如日方所说，在于政治关系方面的渐进积累。比如，孙平化等代表到达东京后，通过与日本政界、经济界，保守政党、革新政党等各界有力人士，以及通产省、外务省等日本政府内部官员的接触，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广泛的人脉基础（杉浦康之，2013：146-180）。尽管中方联络处

的诸多事务已远远超出当初日本政府所限定的LT贸易联络的范围，日本政府并没有对此采取强硬手段，这也是为将来打开中日关系留下回旋余地。另外，互设联络办事处同时带动了互换记者的实现，虽有诸多制约，但双方记者得以在对方国家进行采访活动，这对把握双方国情、促进双方相互理解起到了很大作用。

5 结　语

二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均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吉田茂内阁签订媾和条约，同时与美国、台湾当局签订条约，政治上放弃了中国大陆。之后的几届内阁都力图在该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外交特色。吉田茂后的鸠山一郎内阁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取得苏联的支持加入联合国，回归国际社会，但却放弃了执政前约定的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建立了新的安全体制，但其“亲美反华”的外交政策使中日关系极端恶化；为缓和因安保条约的修订而导致的国内政治的对立与分裂，池田内阁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行“政经分离”下的对华经济外交，在发展中日贸易与美国、台湾当局的反对这一两难境地下支持签署了LT贸易协定，并为促进贸易发展批准了中日双方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一事；后任佐藤内阁的最大外交目标是使美国占领下的冲绳回归本土，因此与岸信介内阁一样奉行“亲美反华”的外交政策，致使LT贸易发展受到严重阻碍。LT贸易的签署以及双方互派贸易联络员、互设办事处的实现均发生在池田内阁的“经济外交”时期，这是池田内阁重视中国市场的体现，但在维护日美、日台关系，坚持“政经分离”方面，池田内阁与其他内阁并无二致。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总体特征来看，鉴于战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复杂多元，实际的双边接触也往往不限于政府的外交部门，政府其他部门不少也凌驾于外交当局之上，在野党或一些民间机构甚至也会插足其中。中日双方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一事由日方率先提出，在松村谦三等日方LT贸易人员与中方的积极推进下才得以实现。其中，非政府渠道的松村等自民党资深议员通过民间贸易机构发挥了影响或干预政府外交功能的作用，体现了日本对华交流中也有“民间先行”的特点。

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也有其局限性。池田内阁时期，池田为了实施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打开大陆市场，把松村当作自己朝向中国的“脸面”，积极听取其意见，虽面临来自台湾当局的外交压力，却力求左右兼顾，最终促成了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的实现，从而促进了LT贸易的发展。但佐藤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却采取了与池田内阁相反的态度，佐藤优先日台关系，对台湾的压力不做任何反抗，对松村等人的建言与抗议不予理会，最终导致LT贸易发展日渐式微。这说明，日本政府首脑的支持与否，是松村等人能否如愿发挥干预政府外交功能的关键因素。但是，无论日本政府的态度如何，这些民间人士和这一民间渠道在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没有民间层面的渐进积累，也没有之后政府间关系正常化的水到渠成。

由于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往来，若没有日本政府的认可与保证，互派联络员、互设办事处将难以实现。从日本政府内部的应对来看，由于意图不同，相关部门对此反应各异。出于促进中日贸易发展的需要，通产省起初就态度积极，想要与松村谦三、冈崎嘉平太等LT贸易相关人员一起促成此事，并在日方联络员的选派、政府补助金的使用等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外交职能部门外务省则坚持“政经分离”政策，并担心会影响对美、对台关系，起初态度消极，松村率团访华并与中方签署会谈纪要后，外务省方才逐步认可在“政经分离”范围内推进互派联络员一事；法务大臣贺屋兴宣虽然不能推翻外务、通产两省的意见，却在中方联络员入境条件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外务省的调解、松村的“威胁”、池田首相的“决断”下，入境问题才得以解决。这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双边接触往往不限于政府的外交部门外务省，政府

其他部门也影响或牵制了对华外交的方向。

互设联络处离不开中方以及松村谦三等LT贸易人员的积极推动，也离不开池田首相、大平外相等政府首脑层的“决断”，这展现了日本政府意图寻求对华“自主”经济外交的积极尝试。但是，面对台湾方面的反对出台“吉田书简”，并派大平外相访台，也体现了日本对华外交的最大特征，即邦交正常化前背景下不可能完全实现“自主”对华外交的局限性。尤其是1964年11月19日佐藤荣作内阁上台后，这种局限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佐藤政府以“吉田书简”为借口，不允许日纺成套设备对华出口的延期付款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融资，并将“吉田书简”的内容作为政府的方针，致使双方签订的日立造船合同以及日纺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失效，LT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41]。

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上选择去争取邦交正常化前格局下最大限度的“自主”，后任佐藤内阁却选择最大限度的服从，两内阁的不同态度也使LT贸易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体现出，日本首相个人或政府首脑对华态度积极与否，决定了其对华外交的受限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其外交成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由于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政策、亚洲紧张局势的影响，LT贸易以及联络处的活动受到很大冲击，中方联络处人员相继被召回，日方人员也相继回国。直至1971年国际形势好转，中日邦交正常化势在必行之际，双方才重新增派人员并把联络处作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事前准备的重要窗口。故此，双方的LT贸易联络办事处作为无邦交背景下连接两国之间的唯一准官方渠道，虽经风雨飘摇却一直未曾中断，不仅推动了两国间人、物、情报的交流，并在推动双方的友好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为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日本主流报纸涉华报道视野下的中国对日外交研究（1949–1972年）》（项目批准号：22YJAZH068）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刘守军；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日本馆藏涉华档案中的日本官方中国形象认知研究（1945–）》（项目批准号：24YJAZH098）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鹿雪莹]

注

[1] 王振锁.旧金山体制的确立与中日关系[C]//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46-160.
[2] 杉浦康之.知日派の対日工作——東京連絡事務所の成立過程とその活動を中心に[M]//王雪萍.戦後日中関係と廖承志：中国の知日派と対日政策.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136-140.
[3] 孙平化，王晓云.关于日本情况的报告（国务院外办外事简报）（1963-06-03至06-09）：档号105-01863-03[A].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963-06-09.
[4] 廖承志的下半年对工作的请示报告（08-28）：档号105-01863-01[A].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963-07-25至1963-08-28.
[5] 国务院外办第二年度中日备忘录贸易日方代表团简报（第1-9期）（1963-09-16至09-26）：档号105-01589-06[A].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963-09-26.
[6] 経通.新井代議士言明の日中関係促進策に関する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2-19.
[7] 外務省.LT貿易駐在員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2-26.
[8] 通商産業省.日中間の貿易駐在員常置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2-28.
[9] 連絡事務所の相互設置並びに代表の相互派遣に関する高碕事務所と廖承志事務所の会談メモ（1964-04-19）；日中双方の新聞記者交換に関する高碕事務所と廖承志事務所の会談メモ（1964-04-19），均收录于：嶋倉民生，井上正也.LT·MT貿易関係資料：第5巻[M].東京：ゆまに書房，2018：332-334.（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所蔵）。
[10] “日中親善の面目は一新しよう” 松村謙三氏が指摘[N].亜細亜通信，1964-04-21.
[11] アジア局.松村議員訪中に関しての要望事項：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04.
[12] 日中貿易連絡員常駐 早く解決したい 首相、松村氏に答える[N].朝日新聞（夕刊），1964-05-07（1）.
[13] 東西通商課.ニチボー·ビニロン·プラントの中共向延払輸出問題の経緯及び海外の反響：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2-06.
[14] 中共向けプラント輸出問題に関する経緯：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2-05.
[15] 中国課.高碕、廖承志事務所駐在員の交換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21.
[16] 経済局.LT貿易駐在員に関する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24.
[17] 中国課長.中国課長コメント：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24.
[18] LT貿易駐在員の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28.
[19] 経済局.古井、岡崎両氏の大臣への報告要旨（LT事務所関係）：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4-28.

[20] 経済局.高碕·廖承志両事務所の駐在員交換問題に関する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02;外務省.高碕·廖承志両事務所の駐在員交換問題に関する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04.
[21] LT駐在員: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04.
[22] 経済局.高碕·廖承志両事務所の駐在員交換問題について(法務省見解):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25.
[23] 外務省.高碕·廖両事務所の連絡員交換に関する法務、通産両省の見解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30.
[24] 在中華民国木村大使宛大平大臣発電報.日中貿易連絡員の交換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6-27.
[25] 経済局.高碕·廖両事務所の連絡員交換について(中山·岡崎会談):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6-27.
[26] 台北木村大使.中共在日連絡所設置に関する当地紙報道: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6-29.
[27] 日中(中共)間通商機関設置等に対する国府大使館抗議に関する件:リールNo. E'0212[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9-21.
[28] 外務省情報文化局発表: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7-02.
[29] 在香港新関総領事.松村議員一行の帰来談報告の件: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5-12.
[30] 経通.中共側貿易連絡員顔振り決定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6-03.
[31] 東貿通.構想は中国バイヤーの常駐　LT貿易連絡員漸く実現へ　政治活動禁止は了解事項で: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7-04.
[32] 東西通商課.高碕·廖両事務所の連絡員交換について(松村氏より廖承志への電話連絡):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7-03.
[33] 経通.LT貿易連絡員の日本側派遣員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9-03.
[34] 中華民国木村大使宛椎名大臣発.LT貿易日本側連絡員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10-05.
[35] 経通.LT貿易連絡員の日本側派遣員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10-14.
[36] 経通.LT貿易連絡員日本側派遣員訪中に関する中共側の同意通報(報告):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1-11.
[37] 東西通商課.LT貿易に関する高碕事務所大久保事務局長の内話(報告):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1-14.
[38] 中国課.高碕事務所北京連絡所に対する外務省員派遣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11-15.
[39] 経通.高碕事務所北京連絡事務所経費の送金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6-07-18.
[40] 毎日新聞.日中貿易、新時代迎える　政府間貿易へ布石　連絡員の設置　互恵平等取り引きへ:リールNo. E'0213 [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4-07-03.
[41] 廖承志事務所致高碕事務所電文: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4-05;経通.ニチボー·ビニロン·プラント輸出契約失効について:リールNo. E'0213[A].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65-05-07.

参考文献

山影统.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廖承志——20世纪50-60年代中日联络机制的形成过程[J].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1).
井上正也.从日本的外交史料看廖承志的对日工作——以自民党亲中派为中心[J].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9(2).
李明楠,宋志勇.池田内阁对华贸易中的"两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应对[J].安徽史学,2022(3).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张千任,陈景彦.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9,38(6).
鹿雪莹,刘守军.LT贸易协定成立过程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作用与影响[J].安徽史学,2017(5).
阎树森."LT贸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J].日本学刊,1992(4).
井上正也.日中LT貿易の成立と池田政権1960-1962[J].六甲台論集:法学政治学篇,2006,53(1).
木村隆和.LT貿易の軌跡:官製日中「民間」貿易協定が目指したもの[J].ヒストリア,2009(216).
古川万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M].東京:原書房,1988.
長谷川貴志.日中LT貿易交渉と外務省:「岡崎構想」をめぐる省内での検討を中心に[J].駒澤大学大学院史学論集,2012(42).
鹿雪瑩.古井喜実と中国:日中国交正常化への道[M].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M].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鹿雪莹　女　汉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
联系方式:E-mail:2684760849@qq.com
作者简介:刘守军　男　汉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
联系方式:E-mail:2120105768@qq.com

Research on Japan's China Policy Decision-Making Model Prior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Mut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LT Trade Liaison Offices

Abstract: In November 1962, China and Japan signed the LT Trade Agreement, and Sino-Japanese trade resumed. In April 1964, the two sides further agreed on the mutual dispatch of trade liaison offic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iaison offi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Japan's response to the mutual dispatch of LT trade liaison offic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iaison offi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plore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policy towards China during the LT trade period. Firs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ing liaison offices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the 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of Japan played a role in influencing or interfering with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diplomacy.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l reactions with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ere complex. That is to say, the formation of Japan's diplomatic policy towards China was not limit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diplomatic competent department. The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or compromises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so influenced its diplomatic direction. Thir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liaison offices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side of Japan'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but it also exposed the limitations of Japan'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leaders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directly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Japan'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Keywords: LT trade; establishing liaison offices with each other; Japan's to China; 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Authors' Information:
Lu Xueying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China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E-mail: 2684760849@qq.com

Liu Shoujun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China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E-mail: 2120105768@qq.com

（责任编辑：李广悦）

新版书目

书　名	书　号	作　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现代日语词汇学（第三版）	978-7-5446-8299-2	沈宇澄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新时代日语：新时代日汉互译教程	978-7-5446-8463-7	高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新编日语口译提高篇	978-7-5446-8461-3	凌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日语听解教程（第二版）第四册	978-7-5446-8421-7	胡季静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日语听解教程（第二版）第二册	978-7-5446-8459-0	劳轶琛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新时代日语听力教程（第2册）	978-7-5446-8464-4	毛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
新时代日语学生用书（第6册）	978-7-5446-8416-3	谭晶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5.5